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政治学（第一辑）

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

政治典范 (卷上)

〔英〕拉斯基(H. Lascelles)著 张士林译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二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、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棒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、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」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「活学活用」、「急用先学」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「西学」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「救国」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黑火药大炮能打败仗，这就是「天经地义」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「实用主义」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「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」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的情况来看，「民国西学」是一个比北大「启蒙西学」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「五四运动」及其启蒙大众的「西学」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大的「启蒙西学」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「民国西学」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「启蒙西学」纳入「民国西学」体系，「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」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「冲击」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「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」。反过来说，「翻译」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「会通」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「超胜」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「民国西学」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「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」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〔英〕拉斯基 (H. J. Laski) 著 張士林 譯

政治典範

中華民國十九年初版

卷頭語

自由如情愛，非時刻注意克服之，則不能爲我有；若一度勝利，卽以爲可安享其成，則自由常在喪失中，猶情愛然——自由之戰爭，永無終止，自由之戰場，永不安寧。

尼文孫自由論十六頁

此中大問題，不在發見政府之所規定，而在發見其所應規定者爲何，凡所規定違反人類之良心者，必不能久存。

阿克登爵士自由之史二十四頁

譯者例言

一、西人之文字分章分節中，又有段落，每段落以一意貫串，實合數十句而成，吾國之譯外籍，自侯官嚴氏好將每段落或數段落以己意溶成一片，而後筆之於書，成爲吾國文字之起承轉合，此爲便於吾二十三年前之讀者則可，衡諸嚴氏之所謂「信」則斷乎未合，今一反嚴氏之譯法，每段每句，悉仍原文之舊，每句終結處以○爲符號。

二、譯文務求達意，以中西文字涵義之不同，原文字句中，偶參以吾國人思想上聯類而起之字眼，而不敢與原義妄有出入。

三、政治學說與已往之學術史及現代之環境，互有關係，故於卷首附以賴氏學說概略一文，以明其學說之由來與對於現代之主張，書中所引古人名詞，爲之注明年月，俾讀者可以想見其比附參照之義。

四、近年以來，譯書日多，故新名詞之不經見者絕少，然既有一家之學說，斯有一詞之名詞，與一家之涵義，如 *coordination* 一字譯爲平均酌劑，雖非嚴氏旬月躊躇者比，然亦楚經斟酌，逐處試

譯者序

吾國人之政治觀念，隳於君爲臣綱之說，故數千年聖賢傳之中，求如亞斯大德之書，將君主民主貴族三政體，互爲比較者無有焉，及明之亡，獨有黃梨洲其人，嘆息於兆民萬姓之中，獨私其一人一姓之不公，誠吾國思想界之鳳毛麟角矣，政權私於一人，於是有「真命天子」之觀念，若一國之治亂，此一人得而主之，而多數人惟有委心任運，故孟子曰，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，小說家之言曰，天下大勢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皆運命說之表示，而人力左右說之不昌也，反而觀之，近三百年歐洲，陸克之國會主權論，影響於英國政制者如何，盧騷之民約論，影響於法國革命者如何，哈米爾頓之聯邦論，影響於美憲者如何，此政治思想家於國家根本問題，溯其由來，窮其應用，不獨進國家政制於自然演進之中，且以一家之言，倡導於全國，而國民之政治的自覺性，因之而增進矣，賴司幾之曾曰，人才之不易得者，爲對於國家之知覺，歷史上稍具之者，爲大思想家數人，如霍布士、盧騷、陸克、馬克思輩，以歐洲政治學說之發達，而賴氏猶深慨政治哲學家之不易得，則吾儕之爲東方人者，尙何面目立於大地耶，立國於今世，不徒將他國之已成學說，傳習而誦說之焉，應將政治學上之根本，

一一思索，一一體驗，衡之大勢，斟酌國情，本自己體會有得者，一一達之於國人，道德也，法律也，目的也，手段也，個人也，社會也，自由也，秩序也，主權也，人民權利也，單一也，聯邦也，國家也，國際也，以他人之問題，求自己之答案，然後吾國家亦有吾之政治哲學，如陸克穆勒之於英，黑智爾馬克思之於德，布丁盧騷之於法，此吾之所望於國人，而欲與國人共勉者也，賴氏書之所以譯，所以示英人以政治思想名於世，而其後起學者致力之勤如此，非吾國人所當取法者耶。

賴氏學說概要

一時代之政策，有其一時代之學說爲之後先疏附，以陸克之「民政論」爲十七世紀英國政治之代表，以邊沁之「政治零拾」與穆勒之「自由論」，「代議政治論」爲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政治之代表，則現代之政論家可以代表英國者，舍菲濱協會之槐伯夫婦，工黨之麥克洞納氏，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之柯爾氏，與新進學者之賴斯幾氏外，無可他求矣。我所以獨好賴氏者，槐氏等專爲政治上一種主義鼓吹，而賴氏於政治學有全系統之說明，故繼承陸克邊沁穆勒之正統者，殆賴氏矣乎。

我與賴氏至今無一面之緣。一九二一年講學社擬聘歐洲學者東來，所開名單中，有賴氏其人，託人詢之，謂方有事於著作，不願離歐。留美學者金龍孫，張奚若，徐志摩廣爲我道其形容與學說志摩在美時贈我賴氏「近代國家中之權力」一書，是爲我與賴氏神交之始。賴氏以二十餘歲之青年，受美國之聘，講學於哈佛大學，黨以工人罷工，賴氏起而爲應援之演說，爲警吏所阻，旋返英，爲倫敦生計政治學之講師，與工當自由黨相過從，時參預其密勿，其著作之名與年月表列之於左。

1917, Problem of Sovereignty

1919, Authority in the Modern State.

1921,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ty.

1925, Grammar of Politics.

賴氏政治典範之書既出，倫敦大學特設講座，擢之爲教授。近年之新著兩書，曰馬克思，曰共產主義，賴氏之文生氣躍然，讀之者若感觸電力然，雖以英國現代思想之先導言之，不如槐氏麥氏，然集合各派之長，而匯成一系統，非他人所能及也。

賴氏學說，略分節論之如下：

第一 多元主義的國家論

現代之政治思潮，反對主權論之思潮也，反對國家之強制權，反對主權之表示曰法律，反對國家在國際間主權之無限，其來源起於德國學者奇爾克氏（Gierke）及英國麥德蘭氏（Maitland）。若追而上之，郇狄萬主義者普羅洞氏攻擊國家之論，遠在一八四八年之先，一九〇一年後，無政府

主義者哥羅伯德金起而發政府是否必要之間，於現代政府之專事壓制，言之尤爲痛切，故近代反國家之強烈言論，必以普氏哥氏輩爲先河矣。及一九〇〇年麥德蘭氏譯德國奇爾克之中世紀政治學說，於是社團人格說社團離國家獨立說，大盛於歐，所以倡社團人格說者，卽所以壓倒國家無上之主權，法有狄曠氏（Duguit），龐哥氏，德有奇氏，荷蘭有哥拉勃氏（Kraabbe），英除麥氏及拔克氏外，賴斯幾氏尤稱此運動中之健將也。

賴氏早年之書，皆以主權論名，專爲攻擊主權論而作者也。故其言曰：「近世之主權論，亦卽爲政治組織論。彼等以爲一社會之內，應有惟一之最終決定機關，此機關駕乎一切之上，人民之紛爭，悉依其一句一字爲解決之券。然自政治眼光觀之，此種立論是否正確，大有商榷餘地，且權之來源，推本於一，易流於專擅恣肆，道德上之危險甚大。」依吾人之意，此主權觀念，苟取銷之，政治上歷久不解之糾紛從此絕跡。

自布丁輩以來，咸以主權爲國家之要素，而賴氏獨爲此取銷之論，豈故作驚人之語耶，抑自有其立言根據耶，曰其理由有三，一以社團爲對象，二以國際爲對象，三以個人爲對象。

近世國家之中，有種種社團，或為宗教的，或為社會的，或為生計的，或為職業的，或為政治的，如工會工主聯合會，教員聯合會，律師公會之類，皆社團也，此社團應人民之需要而自然發生，故奇爾克言社團之人格為實在的，為自發的，非因國之許可而存在，試證之事實，英之萬能國會能取消近日工人之集會權乎，能取消天主教會之選舉權乎，夫既已不能，可知主權說之非者一也。

賴氏非大同主義者也，非各國平等論者也，其第六章中論世界今後之文化，曰國際機關應分兩院，一曰立法院，二曰行政院，各國之權力大小不等，故其在兩院中之位置亦不等，此出於英人承認國際不平等之事實，而為此言也，然在兩院中之位置雖不等，而有關全體利益之國際事務，賴氏則斷然認為應由各國公決，其言曰，菲律賓之自治，非美國之事，而全世界之事也，印度之統治，亦世界之事，非英一國之事也，如是國與國互相對待，其權之行使，自不能無制限，故賴氏曰，國際機關之成立有一前提，曰主權的國家之消滅，或曰國家主權之否認，可以知主權說之非者二也。

賴氏曰：「國家之運用，不離乎人。居於主權機關之政府之地位，自以為無所施而不可者，其人不能久安於位。十七世紀英國之內戰與革命一七八九之法國，一九一七之俄國，皆主權問題之極